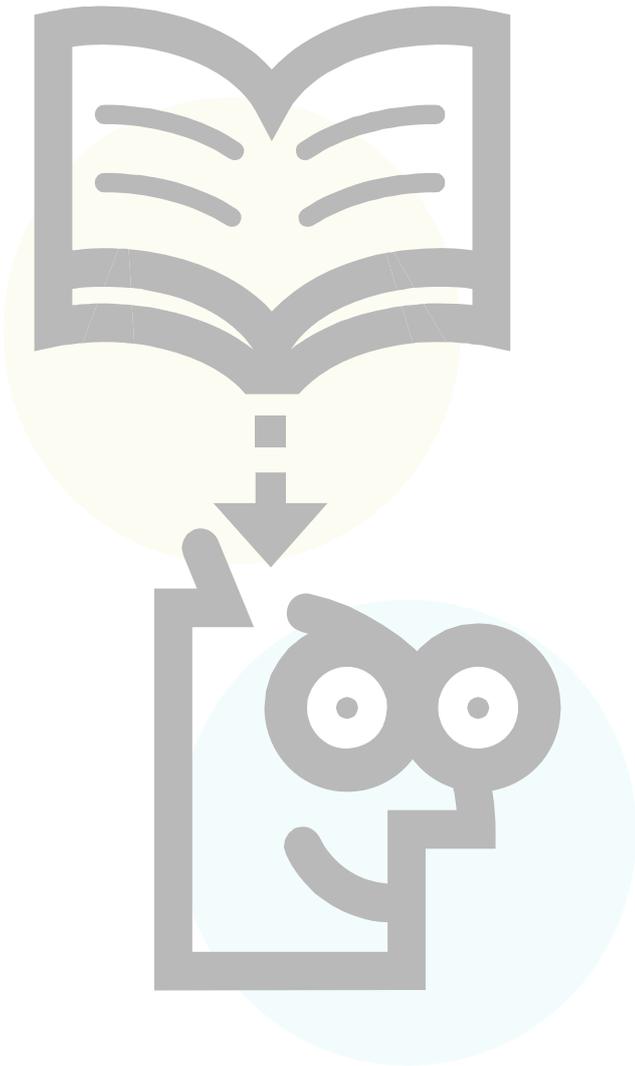




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Shanxi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 信 息 导 航

INFORMATION GUIDANCE

2008年第3期 总第三期

# 目 录

<b>[大学教育]</b> .....	<b>3</b>
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	3
[权威解读]教育部最新推出的高校“特色专业”.....	13
教育学：问题与出路 .....	17
<b>[传统文化与科技]</b> .....	<b>20</b>
《易经》的类比思维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20
传统伦理文化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阻碍作用.....	29
<b>[文学]</b> .....	<b>30</b>
从《兄弟》“上海讨论会”看当代文学批评的症候.....	30
“萨柯——樊塞蒂事件”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	31
严监生形象辨正 .....	32
神话与科学：弗莱理论中的不协和.....	33
<b>[历史与文化视点]</b> .....	<b>34</b>
唐宋文人茶的文化意蕴 .....	39
<b>[学术综述]</b> .....	<b>40</b>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40
<b>[读书]</b> .....	<b>57</b>
王小波：我的师承 .....	57

# [大学教育]

## 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比较研究

(宣小红 林清华 谭旭 伊凡)

一、 大学排行的内涵及类型 (略)

二、 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模式

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模式主要有以下三种。

### 1. 系统模式(system-oriented approach)

所谓系统模式,主要从系统的角度来分析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活动,将其分为输入、过程和输出等环节,对其进行综合考虑。系统模式比较重视所建构指标体系中各指标之间的关联性。指标中的输入类指标强调投入的资源,过程类指标强调将投入资源转化为教学与科研成果的运作机制输出类指标则强调大学的产出成果。

在系统模式中,除了“输入—过程—输出”这一基本型态外,还有“输入—输出”、“背景—输入—输出”?“背景—输入—过程—输出”、“输入—过程—输出—结果”、“背景—输入—过程—输出—结果”等五种延伸型态。在输入、过程、输出各环节,其指标又可以分为绝对量指标和相对量指标。绝对量指标即以总量的形式反映一所大学的整体实力,如大学的科研经费总投入、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量等;相对量指标即以平均量的形式反映一所大学的运行效率,如生均教育经费、生师比等。

### 2. 演绎模式(deductive approach)

所谓演绎模式,指以一个或一系列先验性概念作为评价指标的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层级分析,逐步将这些概念细化、操作化,最终发展出一套指标体系的模式。

在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中,运用演绎模式最为典型的当属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推出的大学排行榜。该排行榜以大学的两大基本功能——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作为一级指标然后逐步演绎出二级指标、三级指标。

### 3. 归纳模式(inductive approach)

归纳模式以现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为基础,将有关方面的指标归纳成一个接近理论模式的体系。归纳模式遵循的是“由个别到一般”或“特殊到普通”的逻辑,其具体做法是:收集相关的资料;寻找合适的理论框架;将收集到的资料整合进框架之中,初步形成指标体系;对指标体系进行加工、处理,形成科学、合理的体系。

相对于演绎模式的规范化取向而言,归纳模式属于描述性的建构取向。一般而言,按照这种方式构建的指标体系可能存在着体系不全、逻辑不严密、理论薄弱等缺点,但其指标的操作性较强,设计出的指标体系很容易为实践部门所接受

在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中,归纳模式被广泛采用。比如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加拿大《麦克林》、中国网大等大学排行榜的指标体系中,一级指标均有学生情况、师资情况、财务情况(网大用内涵更广的“物资资源”代替“财务情况”作为一级指标)等,这些指标基本上都是通过归纳模式形成的。

上述三种分析模式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研究的角度不同而已。为了详细比较各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异同,本文将从以下四个维度进行分析:(1)输入指标/过程指标/输出指标。输入指标包括人力资源(学生、教师)和物资资源(财务情况、图书量、校舍面积等);过程指标包括课堂规模、生师比等;输出指标包括

同行评议、科研成果毕业生质量、校友捐赠等。(2)绝对量指标/相对量指标。(3)教学指标/科研指标。同行评议主要受学校科研水平的影响,因此我们把它纳入科研指标。(4)定性指标/定量指标。

### 三、国外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

#### 1.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

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率先推出全美大学排名,每两年一次。1987年后改为每年一次,并由本科生教育扩展至研究生教育。大学排行的目的是为使学生及其家长明智地选择所要就读的高等学校提供尽可能全面、丰富的信息。评估对象按卡内基的高等学校分类法划分为四类:全国性大学、全国性文理学院、地区性大学和地区性文理学院。其中,地区性大学和地区性文理学院按地理位置划分为北、南、中西、西四个地区,每个地区分别排名。

该排行榜的指标体系由7个一级指标、16个二级指标构成。全国性大学、全国性文理学院与地区性大学、地区性文理学院的评价指标的主要差异在于:(1)“平均毕业率”和“新生保持率”的权重分配不同;(2)“高中成绩在班级前10%的学生比例”的权重分配不同;(3)“高中成绩在班级前25%的学生比例”的权重分配不同;(4)“毕业率履行情况”的权重分配不同。

在16个二级指标中,输入指标有“录取率”、“高中成绩在班级前10%的学生比例”、“高中成绩在班级前25%的学生比例”、“SAT/ACT成绩”、“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全职教师比例”、“生均教育费用”等8项,占总权重的36%,其中,人力资源占26%,物资资源占10%;过程指标有“生师比”、“少于20人的班级比例”、“多于50人的班级比例”等3项,占总权重的9%;输出指标有“同行评议”、“平均毕业率”、“新生保持率”、“平均校友捐赠”、“实际毕业率与预计毕业率比”等5项,占总权重的55%。所有指标均属于相对量指标。仅“同行评议”一项属于定

性指标(权重占 25%),其余 15 项二级指标(权重占 75%)均为定量指标。

## 2. 英国《泰晤士报》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

1986 年,英国《泰晤士报》推出英国大学的排行榜。《泰晤士报》大学排名的指标每年作相应调整,由 1994 年的 15 项调整为 2000 年的 9 项,包括“教学评价”(22.7%)、“科研评价”(13.6%)、“入学成绩”(9.1%)、“生师比”(9.1%)、“生均图书和计算机费用”(9.1%)、“生均设备费用”(9.1%)、“获得第一学位或更高的第二学位的学生比例”(9.1%)、“毕业生去向”(9.1%)、“毕业率”(9.1%)。2003 年,又把“教学评价”改为“学生满意度”,权重降为 15%，“科研评价”调整为 15%,其他 7 个指标的权重均调整为 10%。

输入指标有“入学成绩”、“生均图书和计算机费用”、“生均设备费用”等 3 项,占总权重的 30%,其中,人力资源占 10%,物资资源占 20%;过程指标有“生师比”1 项,占总权重的 10%;输出指标有“学生满意度”、“科研评价”、“获得第一学位或更高的第二学位的学生比例”、“毕业生去向”、“毕业率”等 5 项,占总权重的 60%。定性指标有“学生满意度”和“科研评价”2 项,占总权重的 30%,其余为定量指标。相对量指标超过 85%,反映科研的指标只有“科研评价”1 项,占 15%。

## 3. 加拿大《麦克林》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

《麦克林》的排行是加拿大比较权威的大学排行。目前,该排行榜的指标体系由 6 个一级指标、23 个二级指标构成。《麦克林》把大学分为基础类大学、综合类大学和医学博士类大学,三类大学的排行评价指标略有不同。

在该排行榜中,输入指标有“新生高中成绩”、“平均成绩在前 75%的学生数量”、“外省新生比例”、“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等 16 项,约占总权重的 55%,其中,人力资源约占 21%,物资资源占 24%;过程指标有“低年级班级规模”、“高年级班级规模”等 3 项,约占总权重的 17%;输出指标有“声誉调查”、“校友捐赠”、“保

持率”等4项,约占总权重的28%;反映科研的指标只有“声誉调查”1项,占16%。

#### 四、国内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

##### 1. 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

1993年,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以武书连为首的课题组在《广东科技报》上公布了中国大学1991年研究与发展的前100名,这次排名属于科研单项排名,以成果为主,投入产出比为辅,共涉及25项指标。1997年,指标调整为42项,并以“不同类型大学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作为假设基础。2000年开始引入人才培养评价,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为一级指标,建立了23个二级指标。2001年,该指标体系又做了重要调整,将二级指标体系改为三级指标体系,形成2个一级指标、4个二级指标、24个三级指标。之后基本稳定下来,只做过一些小的增删与权重调整。2002年,用“不同学科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科学假设取代了“不同类型大学的科研人员平均具有相同创新能力”的科学假设,将大学分为四类: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专业型大学。2003年,又对大学进行了重新分类,分为研究型大学、研究教学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2004年,不再将专科生得分计入总得分。2005年,增加本科生质量指标,权重为20%。

从2001年的评价指标体系来看,全部为输出指标、绝对量指标、定量指标,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权重分别为57.09%、42.91%。在科学研究中,自然科学研究的权重为34.74%,是社会科学研究(8.17%)的4倍,如此重理轻文的比例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

##### 2. 网大的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

网大从1999年开始发布中国大学排行榜,至今已发布了8个排行榜。1999年的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只有4个一级指标:“学术”(50%)、“新生质量”、“师

资”、“科研经费”,6个二级指标:“学术声誉”、“学术论文”、“新生高考平均成绩”、“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与教师总数之比”、“生师比”、“科研经费总和”。2000年的大学排行把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依据不同的评估指标体系进行分别排行。重点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有6个一级指标:“学术声誉”、“学术地位”、“学术成果”、“学生情况”、“教师资源”、“物资资源”,14个二级指标。非重点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与重点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相比,少了“学术声誉”这一指标,其他指标均相同,只是各项指标的权重略有不同。2001年以后的大学排行不再区分重点大学和非重点大学,一级指标基本沿用2000年的重点大学排行评价指标,只是名称有些变化。2002年,将“学术地位”改称为“学术资源”。2003年,将“学术声誉”改为“声誉”,排行榜的声誉调查,从过去几年纯粹的学术声誉扩展到综合声誉。

2001年以后,网大各类指标的权重基本稳定,只是相对量指标、绝对量指标和混合类指标的权重有些差异。“学术成果”指标在2001—2003年取人均值,2004年以后改为“人均+总量”;“学术资源”指标在2001—2002年取总量,2003—2005年以“每千名学生拥有量”计算,2007年以“对本科学位点比例”计算;“科研经费”指标在2001—2003年取人均值,2004年以后改为“人均+总量”;“图书量”指标在2001年取人均值,2002年以后改为“人均+总量”。

## 五、几点结论

1. 从输入指标/过程指标/输出指标来看,《麦克林》以输入为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泰晤士报》和网大的排行以输出为主,广东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排行指标全部为输出指标。各个排行榜都比较忽视过程指标,只有《麦克林》在这个指标上达到17%,《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为9%,《泰晤士报》为10%,网大为2%。在输入指标中,《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网大比较重视人力资源的投入,

《泰晤士报》和《麦克林》比较重视物资资源的投入。从输出指标来看,在国外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中,对毕业生质量的评价约占总权重的20%,而我国大学排行还缺乏对毕业生质量的评价。比如在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评价指标中,以培养的学生数量来代替学生质量,完全没有考虑学生的毕业率和毕业去向等反映人才培养质量的指标,这样的评价容易诱导大学盲目扩张。另外,《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麦克林》均给予校友捐赠5%的权重,国内大学排行没有这项指标。

2. 从相对量指标/绝对量指标来看,国外排行榜以相对量指标为主,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几乎全部都是绝对量指标,网大的指标比较均衡,混合指标占34%,既考察总量,也考察平均量。

3. 从教学指标/科研指标来看,国外大学排行重教学轻科研,国内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中科研指标比重偏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反映科研的指标只有“同行评议”1项,占总权重的25%;《泰晤士报》反映科研的指标只有“科研评价”1项,占总权重的15%;《麦克林》反映科研的指标只有“声誉调查”1项,占总权重的16%。“这并不意味着科研不重要,而是因为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是较难精确地加以品评的。”所以,国外大学排行一般只以“声誉调查”来反映科研水平。而在我国,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反映科研的指标有18项,占总权重的42.91%;网大反映科研的指标有11项,占总权重的60%以上。造成这一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我国早期的大学排行几乎都是科研成果的单项排行,这种重科研的传统在短时间内难以根本转变;二是我国大学排行的目的主要在于引导大学的发展方向,特别是在当前我国高校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背景下,科研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指标,自然受到偏爱。

4. 从定量指标/定性指标来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泰晤士报》的定性指标权重比较高,分别为25%和30%,《麦克林》和网大为15%左右,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没有定性指标。

## 六、需要讨论的几个问题

### 1. 大学排行需不需要进行声誉调查

在各个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中,声誉调查所占的比重差别很大。《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占25%,加拿大《麦克林》占20%,中国网大占15%,《泰晤士报》和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则没有声誉调查这一项。那么,中国大学排行到底需不需要进行声誉调查?一种意见认为,声誉调查不适用于目前的中国国情,因为,我国在20世纪中期和末期的两次大调整,使不少学校名不副实;几十年的计划经济的封闭性,大多数以行业冠名的学校不易被人们所了解;不少学校的隶属关系变换太多,使人们无法了解。另一种意见认为,学校声誉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但这种相对的“模糊”也许更本质更准确地反映了一所大学的地位和影响。一所大学最核心的部分往往是管理水平和办学特色及凝聚力等软指标,这些软指标不可测量或难以量化,只能概括地定性描述,因而对大学评价时,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同样重要。

进行声誉调查是大学排行的一种趋势,它可以有效弥补定量研究的不足。虽然这一主观性指标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诚信环境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等条件成熟了再开展这项工作,而应该充分发挥大学排行的导向作用,使社会公众对大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有更全面的认识。当然,为了尽量减少主观误差,应该扩大声誉调查的范围。目前,网大虽然已经开展了声誉调查,但调查的范围仍然比较小,而且回收率很低。

### 2. 大学排行需不需要对学生进行满意度调查

学生是学校产品的直接消费者,他们对大学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感受最直接,也最准确,因此,在大学排行中理应对学生进行满意度调查。但是,在上述几个排行榜中,只有《泰晤士报》设立了这项指标,并且给予15%的较高权重。其他排行

榜均忽略了这项指标。笔者认为,将学生满意度纳入排行指标中,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可以弥补现有排行指标中过程指标不足的缺陷。学生满意度涉及学生对学校教育方方面面的感受和体验,具有评价面广的特点。二是与声誉调查互相补充。声誉调查侧重于对大学科研水平的模糊评价,学生满意度调查侧重于对大学教学过程和水平的模糊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目前排行中教学质量评价难的问题。三是可以使大学排行为学生服务的目的更加凸显出来。学生选择学校不仅看重学校的师资水平、科研实力,更看重自己能否在学校中获得愉快的学习体验,而学生满意度最能反映学生在校的学习和生活状态。

### 3. 如何保证大学排行评价指标的信度和效度

提高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增强指标的可比性。大学排行实质上是一种比较性评估,既然是比较,就得考虑评估对象的可比性,不能用同一把尺子来衡量不同的事物。因此,在排行之前先要对大学进行分类,然后考虑哪种类型的大学可以选用哪些指标。第二,考虑指标之间的均衡性,包括教学与科研的均衡,不同学科之间的均衡,输入指标、过程指标、输出指标的均衡,相对量指标与绝对量指标的均衡,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的均衡。第三,既要保证核心性指标不被遗漏,又要减少重复性指标。比如毕业生质量是衡量大学办学水平和质量的核心性指标,但我国大学排行评价指标体系中却缺少这一指标,要么以毕业生数量来代替毕业生质量,要么以生源质量来代替毕业生质量。而在网大指标体系中,“声誉”、“学术资源”、“学术成果”这3个指标中,就存在指标重复问题。

### 4. 如何处理指标的“时效性”问题

大学的办学水平和质量是长期积淀的结果,那么,评价现在的大学水平,究竟从哪个时间段开始计算呢?在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获诺贝

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的折合数”、“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教师的折合数”这两项指标采取对不同年代的获奖赋予不同的权重,每回推10年权重递减10%;“平均每年发表在Nature和Science刊物上的论文折合数”则以5年为时间限制,即只计算过去5年发表的文章数量;“被科学引文索引(SCIE)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收录的论文数量”以1年为时间限制,即只计算过去1年被SCI收录的论文。《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世界大学排名强调根据大学的当前实力作出评估,或至少根据大学最近发表的统计数据进行排名,而反对直接把大学的历史荣誉纳入评估指标中,如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等指标。网大和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一般选择排行前一二年的数据进行统计是否合理,目前还没有人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看来,如何处理指标的“时效性”问题,依然是大学排行的一个难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本文有删节)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教育部。此文发表于《教育研究》2007年第12期)



[权威解读]

## 教育部最新推出的高校“特色专业”

来源：中国青年报

刚刚过去的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留给人们心灵阵痛之余，也促使很多年轻人思考——怎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自然、应对灾难，帮助受灾同胞，建设好我们的家园？

对于有志将来一展身手的考生来说，地质学、建筑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安全工程、城市规划等相关专业由此进入志愿填报的视野。在任何时候，将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及社会需求相结合，都是富有远见的明智选择。近一年来，教育部、财政部启动实施的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着力打造了一批高校特色专业，从国家战略层面为青年们提供了一个规划未来的参考手册。

### 第一批 420 个和第二批 707 所高校“特色专业”脱颖而出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是借鉴前苏联模式，这种模式很重要的特点是按专业划分来培养人才。因此，专业建设的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这是我们建设特色专业的初步想法。”

5月21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为促进高校面向社会需求培养人才、强化实践教学，帮助学校形成自己的特色与品牌，十一五期间，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分5批在高等学校立项建设3000个左右的特色专业建设点。在这5批特色专业建设点中，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主要是依据

国家需要，在优先发展行业、紧缺专门人才行业和艰苦行业中，选择若干专业领域的专业点进行重点建设，由地方和高校推荐，教育部、财政部择优遴选，每个专业点给予 80 万元的经费支持。

第二至第五批特色专业建设点主要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选择优势明显、特色鲜明的专业点进行重点建设，由各地和高校按照规划，结合实际，择优推荐，每个专业点给予 20 万元的经费支持。

2007 年 8 月和 10 月，教育部、财政部先后启动了“第一、二批特色专业建设点”的申报工作。通知下发后，各高校申报十分积极。“以第一批特色专业建设点为例，420 个专业是从 455 所学校申报的 1809 个项目中，经专家评选和网上公示产生的。”该负责人说。

2007 年年底，第一批 420 个和第二批 707 个专业从全国高校 3.2 万多个专业中脱颖而出。这些专业符合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具有较长的办学历史和良好的办学传统，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密切，改革富有创新性，堪称高校专业的“特色队伍”。

据悉，2008 年度“第三批特色专业建设点”的推荐遴选工作已于近期启动。

### **考生可从不同院校的特色专业了解国家的战略布局**

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遴选和建设，一方面可以促进学校制定出一套好的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包括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及教学管理等多方面的探索与建设，从而推动全方位的教学改革。另一方面，特色专业建设重点是强化实验实践教学，大力推动产学研结合，实现教学内容和社会需求的对接。同时，通

过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建设，集成有效经验和实践效果，形成该专业建设的相关参考规范，以点带面，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对广大学生而言，推出这些特色专业的意义又何在呢？其实，翻阅特色专业建设点的名单不难发现，这些分布在不同院校的特色专业，不仅能反映出各高校的优势资源和办学特色，而且还能帮助考生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国家的战略布局。

“围绕国家的战略需求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来确定特色专业，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原则。”该负责人介绍说，在筛选特色专业时，为体现这一原则，遴选标准参考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纲要，以及去年8月教育部、发改委等7部委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等。

记者看到，这份七部委发布的人才培养工作意见中，在国家重点领域紧缺人才培养工作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中明确写道：当前要优先支持农业、林业、水利、气象、地质、矿业、石油天然气、核工业、软件、微电子、动漫、现代服务业等重点公益、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以及新兴产业的紧缺人才培养。

在教育部、财政部于今年年初公布的2007年度420个第一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上（详情可登录 [www.zlgc.org](http://www.zlgc.org) 查看），既有清华大学的微电子学、复旦大学的软件工程等传统名校的传统优势专业，也有贵州大学的采矿工程、忻州师范学院的汉语言文学等人们平时不太熟悉的学校和专业。

为何名不见经传的忻州师范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也能入选？对此，该负责人解释说，该校有一套很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学院每年都派一定数量的大学生到贫困地区学校开展“扶贫顶岗实习支教”，既有效强化了实践教学环节，又达到了支教和扶贫的目的。选择这样的学校和专业，体现了一定的导向作用。此

外，对于部委院校和地方院校，因为办学条件不同，在选择时，也要照顾不同的培养模式和培养层次。

### 把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相结合才有长远发展

“我也知道，农林水地矿油这些特色专业是国家需要的，而且教学科研实力也很强，可毕业后收入会不会太低，条件会不会太苦啊？”很多人心中都存在这样的疑虑。

对此，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一名专业人士有自己的看法：现在很多煤矿缺大学生，但现实中，学这个专业的人比较少，一些人学完后也不愿意真正到一线去工作。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偏见和误解。

这名专家认为，有的人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煤矿比较艰苦，其实现在国家的大型煤矿都采用了先进的设备，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像大连海事大学的轮机工程，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就以为干轮机会特别艰苦，可实际上现在这个行业的机械化、自动化和信息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且收入也相当不错。

“我们提倡特色专业和社会需求相结合，这里面提到的社会需求不是简单的市场需求，而是出于国家战略方面的考虑。”专家表示，学生选择国家需要的这些专业，从长远看，肯定不会吃亏。他举例说，前几年，学能源类专业的人比较少，如核电方向专业，当时相对来说社会的需求量也少。2006年，“十一五”规划颁布后，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05—2020）》，对我国核电中长期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规划》确定到2020年，中国大陆核电总装机容量争取达到4000万千瓦，今后几乎每年要新建2~3个百万千瓦级的核电机组。

现在，学核技术及相关专业的人就多了，而且门槛也高了，如果能早一点根据国家战略做出判断，就会走在别人前面。

“像金融、法学等前几年热门的专业，现在的就业形势也不是很好。因此，只看现在的人才市场上哪行热门就选哪个专业，很难保证大学毕业后找工作时会是什么情形。”专家建议，只有把个人发展和国家发展相结合才有长远发展。如果不清楚当前的国家战略，参考一下已经公布的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记者：谢洋）

## 教育学：问题与出路

来源：光明日报

对于教育学的学科地位 and 价值的讨论，自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回溯讨论的轨迹，大体是沿着实证化和哲学化两条脉络展开的。以实证化的方法研究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和价值，是近代以来具有自然科学倾向的教育研究者们的的情怀。他们从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中获得营养和方法，力求使教育学成为像物理学那样的学科。而以哲学演绎为思想方法研究教育问题，其脉络可以上溯到柏拉图那里。在思辨中构建一个绝对完善的教育大厦成为那个时代具有高超思辨能力和完美理念追求的学者的理想。他们在理性主义哲学中获得启示，致力于具有所谓完整逻辑结构的教育学体系的构建。

应当说，上述努力的结果是有相当成效的，教育学在近 200 多年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由此也获得了“学”的地位。特别是 19 世纪末当工业化的理想与哲学思辨在教育学研究中实现了某种结合以后，它获得了更为显著的发展。

然而，当教育学获得发展的时候，对它的指责也与日俱增。一门学科的昌盛与衰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教育学这门学科来说，由兴盛到屡受指责，从深层来看，是它未能充分考察教育活动的特性而被其他显学所左右，结果是游离于教育世界之外，失去了自身的学科特色。

任何形态的教育学体系的构建，都必须充分反映作为人类重要活动领域的教育的特点，反映教育活动的本然性质。教育是具有显著特色的实践活动领域，与人类的存在与成长密切相关。

然而，近代以来的教育学倾向于把教育看作是一种“发现”的活动，试图以自身的逻辑体系去解说甚至规定教育实践活动，认为教育现象及教育规律只是被动地等待被研究和认识之物，教育学的任务则是“发现”教育现象中的诸种属性和规律，功能就是提供关于教育的知识。这种寻求可靠思维程式和技术规范的愿望使教育的内在反思自省性被眼前的利益悄悄地替代，教育的理想蜕变为目标，结果是教育学离教育实践越来越远，不仅无力予丰富多彩的教育实践以贴切的解说，而且也难以予教育实践活动以有力的指导。

为了克服这一现象，教育学就要深深地植根于教育实践，返回于教育实践的创造本性之中。我国有悠久的教育学术传统，在长期的日常教育实践中，经世致用和学思行统一的思想方法使我们形成了一套存在于其背后且支撑我们的教育行为的日常生活的“教育学”。这种日常生活的“教育学”源发于对具体教育情境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性判断，它是教育家们所开展的行动研究和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实践智慧，是一种没有被课题化于人的生活之外的、具有真切人性色彩的教育实践和认识。因此，反思我国教育研究的现状，迫切需要促进教育理论与当代教育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不断发现和解决当代教育发展中的重大课题，进而实现教育理论的内在价值，使之不断获得新的要素和新的生命力，成为向当代教育实践开放并确有贡献的活的学问，而不是在

相对封闭的学术圈内自言自语的死的学问。

教育学的学术旨趣不是要站在生活之外去“看教育”和形成有关教育的“完整知识”，而是要把生活作为一切教育认识及其活动的根源和终极意义所在，挖掘和提升人生的价值，实现可能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反映时代精神的教育学是一门具有鲜明人文色彩和独特文化品格与价值追求的学科，它以研究提升人的价值、使人获得更加有效的发展和建构人的生活价值与生命意义为旨趣。面向实践的教育学不能无视生活的价值，生活世界是教育的存在方式和教育问题意识与教育思维方式的来源，也是教育学赖以生存的根基。而教育学知识源于对教育实践情景的理性批判，是学者们基于生活、基于对教育在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解和把握获得的。作为论说教育现象和活动的言语，教育学是一门实践的、自觉的、境遇式的学问。既然如此，教育学在论说作为完整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教育时，就不能以构建某种自足的逻辑体系为主臬，也不能以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操作手册般的说教为旨趣，它要通过与教育实践的交互作用，不断发现和解决当代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问题。

在这层意义上，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教育学不仅要把当下的教育当作“看”和“思”的对象，更要把它当作“做”的对象。它的学术使命不仅仅是“看”或“思”教育，也不仅仅是“言说”或“交流”教育，更是要“介入”或“实践”教育。教育是在生活中实现的，为此，教育学要回归到生活的本源上，以生活中的“对话”来唤醒和引发蕴藏在人的身上、属于生命本有的力量。可以说，如果教育学没有脱离或肢解活生生的教育实践，没有沉溺于教育实践的过去形态并把它等同于现在式或将来式，将其视野指向人类精神得以生长和存在的生活世界，曾一度失落的人的意义就能重新复归。

作者：刘旭东

# [传统文化与科技]

## 《易经》的类比思维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2004年,杨振宁先生发表演讲,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所以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杨振宁先生的观点,引起了国内外激烈的争论。时过近两年,争论还在继续,支持者与反对者都无法说服对方。杨振宁先生是从《易经》的思维方式这一角度来分析问题的,如果不从思维方式上进行回应,无异于无的放矢不能切中要害。

杨振宁先生认为《易经》的思维方式是归纳推理。这是海外中国哲学研究者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看法。例如成中英先生曾说:“《易经》的形成,展现在时间的整体及其推移中,反映出自然与人性结合一体所含藏的深意。我们可以将象征视为提供了一个归纳性的与经验性的形而上学;在一个动态的象征体系中,此归纳—经验的形而上学,乃通过表象而显示出具有宇宙论意义的主要相关事件和现象。”但是,《易经》的思维方式与其说是归纳,还不如说是类比;与其说是归纳思维阻碍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发展,还不如说是类比思维。归纳是一种科学的推理方式,除了不完全归纳外,归纳推理得出的结论是科学可靠的。而类比思维就不同了,得出的结论只具有或然性。而且,由于类比思维的滥用,造成中国科技史上比附大行其道,确实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向近代科技的蜕变。下面试作详细论述。

### 一、类比是与归纳不同的思维方式

要弄清《易经》的思维方式到底是归纳还是类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二者的关系。关于归纳推理与类比推理的关系,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类比推理是归纳推理的一种。如宋文坚主编《逻辑学》说,归纳推理有很多种:一枚举推理;二、类比推理;三、排除推理;四、概率推理。中山大学逻辑教研室编著的《逻辑导论》、诸葛殷同、张家龙等编著的《形式逻辑原理》等书持相似

观点。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类比推理不同于归纳、演绎推理：“类比推理不同于演绎推理，也不同于归纳推理。从思维进程看，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而类比推理是个别到一般或一般到一般的推理。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性的，而类比推理的结论与不完全归纳推理一样，是或然性的。”类比推理也不同于归纳推理(指不完全归纳推理)。归纳是从个别(或特殊)到一般，类比推理是从个别到个别。”类比推理被视为与归纳和演绎并列的一种推理方式，是从具体到具体的比较，但从微观方法论的角度看，类比推理本身也包含着归纳和演绎。”)张晓光先生对此问题曾作过全面的综合考查。我们参阅不同的形式逻辑教材，可以发现，绝大多数意见认为，类比推理是与归纳推理不同的一种独立的推理方式。例如：南开大学哲学逻辑学教研室编著《逻辑学基础教程》，张锦厘《实用逻辑教程》，孙仁生、任书来、林新年主编《普通逻辑原理》，鄂启庭编著《形式逻辑》，陈翼浦《形式逻辑》，苏天辅《形式逻辑》，李小克编著《普通逻辑学教程》。张则幸、黄华新著《普通逻辑学习指南》于“难点解析”中用表格列出类比推理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联系与区别，简单明了，十分有说服力。从此表可知，造成把类比推理当作归纳推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类比推理与不完全归纳推理十分相似，极易混淆。综上所述，类比推理不同于归纳推理，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 二、《易经》的思维方式是类比

关于《易经》的思维方式是类比而不是归纳，我国学术界已有定论。下面稍引部分著作略作说明：

朱伯崑《易学哲学史》上册云：“就《左传》、《国语》提供的资料看，春秋时期的占法，所取的物象，乾有天、玉、君父；坤有土、马、帛、母、众；坎有水、川、众、夫；离有火、日、鸟、牛、公、侯；震有雷、车、足、兄、男；巽有风、女；艮有山、男、庭；兑有泽、旗。”显而易见，不是从天、玉、君父等事物中归纳出乾卦，

而是把这些事物和乾卦相类比。

王树森《周易与中华文化》云：“《系辞下》说：‘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这就是说，《易》之所以有彰明往事，预见未来，以断吉凶的作用，主要因为它用细小的具体的事物类比说明重大的普遍的道理。韩康伯注曰：‘拖象以明义，因小以喻大’。可知，取类明义是《周易大传》意象思维的基本方法。”

翟廷晋《周易与华夏文明》云：“《周易》推理的基本方法有三种，一是根据卦象的象征意义，进行类比推论，对所询事物情况的吉凶祸福作出断定；二是根据相关卦辞爻辞的内容，进行类比推论，对所询事情的吉凶祸福作出断定；三是将卦象的象征意义和相应卦辞爻辞的内容结合在一起，参验比照，进行由此及彼的推论，以确定所询事情的吉凶祸福。”

论文有：

陈鼓应《〈象传〉的道家思维方式》云：“（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贯穿于《象传》全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夫易者，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

张晓光《〈周易〉中的类比推论思想》。张晓光先生从三个方面概括了《周易》的类比思维：一、在“观物取象、以象尽意”中张显类比推论思想；二、在“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基础上深化、丰富类比推论思想；三、以“取象比类”作为类比推论的方法和目的。

张本一《〈周易〉开创了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先河》云：“至此，我们可以说，八卦制作的途径和基础是‘观物取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而其方法则是类推。所谓包牺（伏羲）‘观物取象’‘始作八卦’，就是对自然的认识了解，对人类自身及其思维作用的研究。”

周山《〈周易〉诠释若干问题思考》云：“由于初始符号的确切的属性表达，由此构成的八个经卦所象征的物类的确定性，决定了六十四个重卦的‘拟象’特点及其‘尽意’功能‘。以言明象，以象尽意’的隐喻特点，决定了《周易》符号系

统是一个具有类比推理性质的符号系统,而且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独一无二的类比符号推理系统,完全有别于西方那些演绎性质的符号推理系统;类比推理的性质,同时也决定了《周易》推理的结论具有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

丁祯彦《冯契对〈周易〉辩证逻辑思想的研究》云“:《易传》在作这样的归类时,实际上是把卦象(类概念)看作代数符号,运用这些符号来规范现实,从而为现实世界的各种事物、各种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和互相转化,提供广泛的类比和推测,这种类比和推测,如能与事实验证密切结合,便是很好的科学方法;如果主观地加以运用,那就会陷入宗教迷信的深渊。”

李存山《对〈周易〉性质的认识》云“:我又在《试论周易作为一个形式系统》一文中把对荀子‘以类度类’思想的分析用于对《周易》的分析,指出《易传》用‘其取类也大’来论证《周易》可以占卜吉凶,可以‘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正是体现了‘以类度类’‘、以道观尽’的思想。这种思维方式在以后王弼和程颐、朱熹的易学和哲学思想中也一直延续。”

以上材料仅为举其大端而已,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而关于其论述过程,更是无法在此详述。但《易经》的思维方式是类比,是毋庸置疑的。

### 三、类比思维的优点与缺点及对中国古代科技的影响

类比思维既是《易经》的根本思维方式,也是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李宗桂先生说“: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类比、比喻、象征等思维形式,从本质上看,是同一形态的东西。比喻是类比的表现形式,象征即是隐喻,是一种特殊的比喻。三者都建立在经验的、具象的基础上,都是主体借助一定的物象或原理,以阐明特定的情感意志的一种方法。”这种思维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由于类比推理仅仅依靠事物之间的相同点来推理,其结论自然不可靠“:类比推理前提不蕴涵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类比推理所依据的是两事物一部分属性相同,进而推知另外属性也相同,这样,前提不能蕴涵结论,推理的根据不够充分,不能保证结论必然正确。”所以“,由于类比推理的可靠性不大,在科学研究中,不可能单纯用它来建立一条科学

定律。”美国汉学家陈汉生说：“类同,根据它的地位和定义来判断,在同异范畴中特殊性最小。无论哪一方面,只要事物在这一方面相同就可以认为它使得它们同类。反之,几乎没有哪类事物可能被认为是‘非类’,指出某些差别并不能驳倒两个物质种类相似这一提法。”在古代中国,这种类同推理被普遍使用,中国人习惯于把所有的事物都归于阴阳两大类或五行五大类里面。“当类比推理的事物都只含一个相同元素,就是简单类比推理。”由简单类比,就极易走向比附。“所谓比附就是在不同的类之间建立某种必然性的联系。它表现为对类的一种非本质的认识,表现为对类的一种表象性的理解,并且在此基础上对宇宙或自然结构本身的牵强解释……比附有两种,一种是附象,另一种是附数。而在所有的比附中,又以对五行的比附最为突出和典型。”遗憾的是,比附在中国文化中大兴其道、泛滥成灾。

当然,类比思维也有优点,尤其是在科学认识上。比如,类比有助于科学发现;类比还有辅助性的辩护功用。张晓光先生说,古代中国之所以长期在文学艺术方面有着一种浪漫想象的传统,之所以长期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发明创造性,并且成就举世无双,这在相当程度上都和类比思维之擅长和保持相当大的活力有关,这种擅长与活力,不仅是想象力的源泉,而且也是中华民族富于创造力的源泉。类比思维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独有的思维方式,与中国文化实用取向密不可分:“实用取向,即直接功利性,从事物的表层关系判断利益得失。所以中国人很难怀着虔诚之心去从事科学研究,进而把对象升华到形而上的层面加以探讨。中国人注重实际的价值取向决定了人们急于用一种现象解释另一种现象,压抑了对一种现象深入研究的可能性”。《易经》的类比思维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影响,表现为中国人用哲学上抽象的阴阳五行观念来解释自然界的种种具体现象。中国人认为,组成宇宙的根本物质是“气”,“气”分阴阳。“气”是万金油,一用“气”这个模糊概念,任何理论上的障碍都消融了,造成比附大兴其道,严重制约了对自然界具体物质的深入研究。而西方近代科学是建立在对具体物质的研究上的,原子理论是现代科学的基石。西方科学以追求确定性为目标,所得到的结论要靠反复实验来确证。

古代中国人用阴阳五行来解释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物质现象,自以为解释了,实则只是想象中的自圆其说而已。由阴阳五行的类比思维所得出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很难用科学的实验手段来确证。所以李约瑟说,《周易》对世界的解释,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周易》的精心雕琢的象征符号体系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害的障碍。它诱使那些对自然界感兴趣的人停留在不是任何解释的解释之上。《周易》是一个仅仅把新奇之物分类记忆,而没有对它作任何进一步研究的体系。”

从李约瑟对《周易》的态度我们可以知道,他认为《周易》的思维方式是导致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他的观点得到很多人的响应。如何丙郁先生说“:如果中国的科学家完全满足于《周易》的体系所提供的解释,他们就不会再进一步去寻找各种科学研究中的数学公式和实验证据了。就这一点而言,人们可以把《周易》的体系看作是在中国抑制各种科学观念发展的因素之一。”由此可见,杨振宁对《易经》的批评,其实是李约瑟的观点在 21 世纪的余响。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也说“:中国的科学就是这种发展停滞的一个触目惊心的例子。它产生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以及诸如此类的浩如烟海的百科全书。但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扯淡。怎么可以把在许多世纪中付出这样多的勤劳和机智而其结果却完全等于零呢?这是由于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无疑主要的是由于这些所谓的科学中的每一种都是奠基在僵化的概念上,而这些概念从来没有受到过经验的检验,它们差不多只是包含着一些带上神秘主义前关联的模糊的未经实际证实的概念”“;这些概念会变成捕风捉影、空洞无物的议论的主因,变成抱残守缺的根源。”

李约瑟批评的是《周易》,他没有直接批评中国人的类比思维。而类比恰恰是《周易》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列维·布留尔批评的是中国文化中那些未经实际证实的“带上神秘主义前关联的”僵化的概念。而导致这些概念产生的原因,正是类比思维。类比思维可谓是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与其说是《易经》阻碍了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还不如说是类比思维导致了中国近代科技的落后。正如李宗

桂先生所说：“它(中国传统思维)促进了中国人的意会、体悟能力的发展;它对于人们凭借经验领悟自然界特别是社会人生观象中某些不可言喻的深层意境,有着引导和升华作用;对于中国文化在人际和代际之间的经验性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正因为象征性思维的意会性和非精确性却妨碍了中国人的思维向高度思辩发展。而意会性和经验性的粘合,则妨碍了以抽象概念为理论基因,依逻辑规则进行构造,必须也可以用语言准确表达的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易经》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应该是成立的。

#### 四、类比思维是原始思维的遗留

中国人喜欢使用的类比思维,乃是原始思维的遗留表现,这一点尤其表现在具有中国特色的阴阳五行说上。“。阴阳五行系统中天道自然和社会人事之间以及系统的要素之间,都存在着交感互渗性的联系。总之类比造成了结构,互渗形成了内在的运动机制。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中长期保存的‘天人互渗’的观念,都与阴阳五行的类比互渗思维的影响有直接的关系。应该说阴阳五行的类比互渗思维已超越了原始思维阶段,但仍残存着原始思维的质性。”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是中国人原始思维的一大总纲。“这种天人同构、同类相感的观念本也根源于原始人的类比联想和巫术宗教。”这种‘天人感应’的阴阳五行系统论的宇宙观,在汉代逐渐成为整个

社会所接受的主要的统治意识形态,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它同审美和艺术创造也有密切关系,并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的美学和文艺理论。”

由类比而至比附,则更是原始思维所导致的原始巫术的残余表现。“比附形式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一种比类思维的返祖现象,它是向比类思维源头的复归,复归到比类思维的哺乳时期。在比附身上我们重新看到了巫术的色彩,这可以说是潜藏在思维深处的原始细胞或野性因子的激活和复萌。”

关于这一点,西方哲人所作的研究很有说服力。列维—斯特劳斯认为原始人的思维是“类比的思维”：“它构造了思维的结构,这有利于人们在理解这个世界

时把世界看成和这些结构相似。从这种意义来,野蛮人的思维可以界定为类比的思维。”维柯则研究了原始人的类比心理“:人类思想的次序是先观察事物的类似来表达自己的,后来才用这些类似来进行证明,而证明又首先援引事例,只要有一个类似点就行,最后才用归纳,归纳要有更多的类似点……对尚未发达的心灵,只要提供一个类似点就足以说服它们。”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列维·布留尔更是从逻辑的角度研究了原始人的逻辑思维方式“:他们把原因和前件混淆起来了。这应当是一个以 *Post hoc, ergo propter hoc*(在这个之后,所以因为这个)的谬误而得名的极普遍的逻辑错误。据他们说,原始人极少想到这可能是谬误。他们意识中表象的连贯性,就是这些表象彼此连结起来的足够保证:更正确地说,他们没有想到连结还需要什么保证。”他把原始人的思维称为“原逻辑的思维”。“它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我说它是原逻辑的,只是想说它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首先是主要服从于‘互渗律’。具有这种趋向的思维并不怎么害怕矛盾(这一点使它在我们的眼里成为完全荒谬的东西),但它也不尽力去避免矛盾。它往往是以完全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矛盾的。”

自“李约瑟问题”提出后,人们一直在思考中国科技为什么在近代落后的问题。从思维方式的角度来看,《易经》的类比思维对中国古代科技既有积极的影响,也阻碍了中国人对自然界的进一步研究。分析《易经》的类比思维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许外芳,此文发表于《湖北社会科学》2007.11)

##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的影响

牛冲槐、王聪、芮雪芹、樊燕萍、郭丽芳在《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年第1期撰文指出,科技型人才聚集现象是指在区域要素边际利益差异和自我价值实现等因素的引致和驱动下,在一定的时间内随着科技型人才的流动,大量同类型或相关人才按照一定的联系,在某一地区(物理空间)或者某一行业(虚拟空间)所形成的聚类现象。人本思想的积极影响是能够培养科技型人才的团队精神、合作精神,消极影响是忽视了个人的自身价值,势必压抑每个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政治伦理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推崇非功利性,激发了科技型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削减了各种利益冲突,增强了凝聚力和协调性,同时也破坏了人才聚集效应的动力机制。“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其正面作用是能够始终而又往复不断地激励一部分科技人才在某个领域、某个阶段、某个区域努力工作、出类拔萃,但也会出现由权力寻租导致的资源配置不科学、不合理。“中庸之道”的正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它能够引导人们营造一个和谐的人际关系环境,但也禁锢了科技型人才的变异思维,产生羊群效应。“经世致用”的学术观一方面可以促进创新效应特别是技术创新效应的产生与扩散,另一方面,又可能制约着科学创新的产生与发展。在这种学术观的支配下,历史上我国就比较重视实用技术而轻视基础科学的研究。

## 传统伦理文化

### 对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阻碍作用

刘晓飞、姜文化在《天府新论》2008年第1期撰文提出，中国在古代曾创造了绚烂的科技文明，其中伦理文化功不可没。可当世界进步到资本主义文明时期，当科学要迈向高速发展的近代科学的门槛时，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特别是对科技的阻碍就日益显现出来了。与西方相比，中国缺乏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作为新文明象征的近代科学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范围内不能产生便也不足为奇了。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伦理观在发展进程中，伦理政治化使其最终禁锢为封建制度与宗法的卫道士，使知识分子失去追求科学的兴趣与动力，使科技失去人才基础；注重内省的方法论，使中国古代科技一开始就没有正确的方法指导；“贵义贱利”的价值观束缚了人们的追求，使社会失去对科技发展的推动力；而对劳动人民的鄙视态度，更使中国失去产生近代科学的可能。

# [文学]

## 从《兄弟》“上海讨论会” 看当代文学批评的症候

张丽军在《文艺争鸣》2008年第2期撰文指出，余华的《兄弟》是好作品还是坏作品？当代批评家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在众多评论中，有一个地域的声音特别突出地显现出来，就是“上海复旦声音”。从郜元宝对余华《兄弟》的谨慎“欢迎”到陈思和等人——已经清晰传达出来。视阈、角度对余华进行了出了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时代之“象”的审美想象批评操作，在众多否定性一种宝贵的“少数声音”，究。但是，通过对“上海的批评理念、文理的省察，否定性批评，我们依然觉察到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一些不良症候：1、非捧即骂的意气性、二元对立思维批评症候。2、创作引导批评、批评家跟着作家跑的“顺势思维”批评症候。3、祛除批评理性精神、唯市场论的批评症候。而对于余华这样一部恢复性、尝试性之作，一部带有明显的转型、不成熟、未定性的文学作品，郜元宝、陈思和、栾梅健、张新颖等为什么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辩护”热情？陈思和之对余华粗鄙化中的“卑劣与恶”视而不见，郜元宝、张新颖、刘志荣等人之对余华《兄弟》思想的浅薄、“恶”的认同避而不谈，一个重要的批评参照就是余华《兄弟》的超过110万的销售业绩。至此，一套消费时代的文学创作、出版、批评机制及其内在逻辑思维已经明晰呈现出来。



参加的“上海讨论会”  
“上海复旦声音”从不同一次成功的“辩护”，揭示了余华对当代生活、与呈现能力。这种群体性批评声浪中，显现了另外推进了余华《兄弟》的研复旦声音”这些批评文本结合围绕《兄弟》的众多

## “萨柯---樊塞蒂事件”对美国文学的影响

虞建华在《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1期撰文指出，萨柯---樊塞蒂事件发生在1920年4月15日，马萨诸塞州的一家鞋业公司在发薪日遭抢，出纳和一名门卫被枪杀，然后一辆黑色轿车接走了凶手和银箱。三周后，警察逮捕了车主的两个朋友，萨柯和樊塞蒂。公诉人没有确凿的证据，在假想的“红色恐怖”歇斯底里的审判中，陪审团宣判两人死刑。1925年，真正参与抢劫的杀人犯被捕，但州法院却以该人被工会收买为由，仍维持原判。1927年两人被送上电椅。文化界的“营救行动”持续了七年，期间，文学青年的参与过程是一个再教育的过程，事件影响了美国文学的走向，造就了新一代作家。萨-樊事件对年轻一代作家是一帖清醒剂，使他们认识到脱离政治的艺术理想是幼稚的。在七年的营救行动中，文学青年中的左翼实际上已经走到前台，担负起了领导作用。萨-樊事件之前的激进思想，大多出于文化青年反叛传统的一种情绪化的表示，其后则发展成为更加理性化的对社会体制和阶级对抗的认识。至少部分由于萨-樊事件在思想上的铺垫，使激进思潮在1930年代的美国文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从此，一种坚定的批判态度，一种对权威的不信任，一种对乐观结果和浪漫情调的排斥，一种时而隐蔽时而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开始清晰地出现在美国文学的主流之中。直接产生于萨-樊事件的文学作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萨-樊时代”美国文学经历的演变。厄普顿·辛克莱采用的是一种带自然主义色彩的“硬派”现实主义，强调社会语境，注重细节，突出社会抗议的主题，追求社会批判的功效。到了安德森笔下，“泄愤”情绪相对淡化，作家试图跳出就事论事的圈子，更艺术、更泛化、同时更深刻地表现这个悲剧故事。多斯·帕索斯用“摄影机眼”扫

描绘乱庞杂的社会，力求捕捉事件方方面面的关联，同时也希望把 1920 年代的现代主义和 1930 年代的激进主义结合起来，以创新的艺术形式表现革命内涵。法斯特则回到了现实主义，作品注重真实性和可信度，塑造了两个有性格、有骨气的小人物，用冷静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回应麦卡锡主义的挑衅，重提权力滥用的历史教训。比奈利处于后现代主义文学盛行的年代，以一种貌似“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严肃的历史，调侃之间对权力与艺术自由的主题提出再思考，然后又让这种思考不了了之。不同的“萨-樊文本”反映了美国文学发展的许多典型特征。对于很多美国作家来说，萨-樊事件萦绕于心，成为他们情感结构中的动量，成为他们将一再返回的一个主题。



## 严监生形象辨正

杨罗生在《云梦学刊》2007 年第 6 期撰文指出，《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因为临终前的“两个指头”，被当作吝啬鬼的典型受尽嘲讽、唾骂。但把

严监生作为吝啬鬼，作为揭露甚至鞭挞的对象，不仅是对严监生形象的歪曲，也是对吴敬梓创作意图的误解，更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曲解。纵观严监生的一生行事，可以看到严监生的形象是复杂的，具有矛盾的二重性。他既是吝啬的，又是慷慨的。对己吝啬，对人大方。他的性格表现出多层次的特点。他惜钱如命，可又不得不滴水般地花钱；他怨恨乃兄，可临终还是赠银赠衣；他痛惜幼子，可平

时猪肉也舍不得买给他吃；他不满赵氏，可又事事按她的主意去做；他有他的精明，但更多是愚昧；他有他的真情，更多是出于无奈。如此等等，这些看似矛盾的性格却自然地统一在严监生的一生中。严监生形象虽然充满矛盾，但作者自始至终都把他作为“善人”来刻画。严监生看不破金钱，过分刻薄自己，落下“吝啬鬼”的千古骂名，这是善人被误解的悲剧。严监生代表作者对金钱的深刻认识，他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符号。严监生形象告诫世人：面对金钱，要“养其廉耻”，“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今日不乏严贡生，而少严监生，应该为严监生招魂。

## 神话与科学：弗莱理论中的不协和

蒋显璟在《国外文学》2007年第4期撰文对加拿大著名批评家弗莱的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指出，弗莱的批评理论一方面强调科学，一方面又注重神话批评，科学与神话冰炭不同炉，前者信赖实证，后者凭藉想象，二者的不和谐造成了理论系统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弗莱力图建立作为“科学”的批评理论体系，肯定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独立性，既保留英美新批评的观点，即不求诸“外部因素”的“内部研究”；又强调批评的系统性，突破了新批评派只局限于文本分析而不关注文本与历史的关联性的狭隘做法；同时还拒斥文学批评的价值判断，这一点与20世纪中叶的描述语言学有共同之处。另一方面弗莱建构的神话与原型批评理论体系，把个体消融于整体文类中，抹煞了单部作品的具体性和独特性，过分强调了超历史的共时结构，抽除了艺术的具体社会效应。而且它所显示出的对奥秘性的强调、历史循环论观点、对作者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否认，均说明弗莱虚构的巨大封闭系统缺乏对现实的认知功能，是一个子虚乌有的神话乌托邦。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他的理论也缺乏可操作性。

# [历史与文化视点]

## 夏锦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需要新的维度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复、梁启超等的新学与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的国粹学术算起，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至今已经走过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这其中特别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海外新儒学与20世纪九十年代国学热等三次大讨论，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性质、特征及其整体评价逐渐趋于一致。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是人文性，讲求天人合一，追求人的生命价值、人与人的亲善仁爱以及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相处，等等，已经不需要再作多余的论证，相反倒可以放心大胆地作为立论的出发点。风靡一时的“河东、河西论”和振奋人心的“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口号，可以说都是以中国文化的“人文性”特性来立论的。

那么，“人文性”真的就可以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吗？我认为这须对全部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它的源头的文化作过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决定。遗憾的是，这百余年来我们从来没有，或者说还来不及对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来一次全面的调查。这既有时代的原因，也有学术自身的原因。

### 根子里除救亡处无暇甚至不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作一通盘的考察

从时代的原因说，这百余年来我们面对的是西方科学主义文化的大举东渐，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化的救亡成为了民族救亡的一部分。而文化救亡不能采用简单的抵御、排拒的态度来对待异质文化，而是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吸收异质文化的优秀成果，并以其为参照，重新发现自身文化的价值。唯以此，才能重塑它在异质文化面前的形象，确立它的价值地位。这才是真正的救亡

理性。“人文性”正是以西方文化的“科学性”为参照所发现的中国文化的价值之所在。这一发现不仅找回了天朝大国的文化感觉，而且还可以拿它来弥补、批判甚至拯救西方科学主义的弊端。当年的梁启超先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考察回来，“即将悲观的观念完全扫清”，在《游欧心影录》中满怀激情地写道：“我们可爱的青年们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们哩。”而他那个用来超拔的武器正是以“孔、老、墨三位大圣”为主体的“图个心物调和”的中国文化传统。正是由这种救亡理性所驱动，百年来这篇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大文章，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篇命题作文。根子里除救亡之外无暇甚至不屑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貌作一通盘的考察。

### 片面强调一切都须“拿出证据来”，从而助长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怀疑论思潮

从学术自身的原因来说，百年来中国学术受到西方科学实证思潮的影响自无待言，但是由于对科学实证之“证据”的理解存在偏颇，片面强调一切都须“拿出证据来”，从而助长了一种虚无主义的怀疑论思潮，以致对待像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这样的课题，只能放弃对其悠久的历史源头的探索，从而将整体的文化史拦腰砍断。胡适写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这部具有范式创设意义的经典著述中，胡适就认为：“以现在考古学的程度看来，我们对于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只可存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我们拿不出能被现代科学认可的证据，连《尚书》、《易经》都全无史料的价值。因此胡适大胆设定：“故我以为我们现在作哲学史，只可从老子、孔子说起。”

对此，当时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在为胡适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赞叹道：“这是何等手段！”蔡元培把胡适的这一做法称为“截断众流”，即从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而言，老子、孔子只能算流，而不能是源，但由于证据的缺乏，便只得截断众流，把老子、孔子当作源头来叙说。我们并不是说从老子、孔子说起

就一定不对，而是说失去了源的血脉，从而解读出来的老子、孔子能不能、或者说能在多大的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貌，这是值得怀疑的。连胡适自己都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要不懂他的前因，便不懂他的真意义，要不懂他的后果，便不能明白他在历史上的位置。”然而，胡适、蔡元培所倡导的“截断众流”的研究范式却对百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产生莫大的影响。“五四”以来的一大批史著都采用了这种截断“前因”的方法，例如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以“子学时代”开篇，整个中国哲学史就被他分为“子学时代”与“经学时代”两个部分。而影响巨大的古史辩派也因此便对“一半神话、一半政史”的“东周以前的中国古史”加以否定。在这种情况下，要对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作全面的研究就更加困难了。

**在我们中国，正当胡适“截断众流”之时，王国维已经综合大量地下出土的殷商甲骨材料，写下他那著名的学术论文**

从上面所说，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把“人文性”当作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性，这是一个在对它的源头文化缺乏调查与研究、从而没有整体地掌握对象的情况下匆忙得出的结论。而问题的关键恰恰在于，完整的中国传统文化必然包含它的源头文化的维度，而且这不是可有可无、可增可减的一维，从今天的眼光看，一种文化所具备的基本特性与气质，在它的早期源头处就已经孕育，并对以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决定性的影响。虽然由于年代的久远，有关它的第一手资料的匮乏，使得对它的研究有很大的难度，但是，自从西方 19 世纪中叶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催生了现代文化人类学以来，大量的考古资料以及对现存原始族群的田野调查，使得对人类文化源头的研究，摆脱了纯粹思辨形态而归于科学实证的领域，由猜想变为了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有人文性特性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巫性特性**

对中国当代学术而言，这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它意味着我们要以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成结论，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文化的人文性特性的结论为出发点，作新的探索。事实上，已经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比如，李学勤先生提出“走出疑古时代”、“重新估价中国古代文明”、“重写中国学术史”等命题；李泽厚先生提出中国早期的“巫史传统”的命题，等等，它们的深刻意义都在启迪我们：悬置一切结论，从“头”解读我们的文化。只有如此，才会更加切近它的原貌；也只有如此，往昔我们以原有的结论所无法解释的现象，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比如，单单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特性是人文性，就很难回答：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却特别长久？皇朝更替的战乱特别频繁与残酷？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第一次真正提出人的解放的问题，并且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整个民族孜孜以求的最高目标？这些问题如果联系到中国异常发达的初始源头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除了有人文性特性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巫性特性。正是有它的在场，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些疑难疙瘩才会被真正解开。

巫性是巫术文化的集中表现。巫术文化在人类早期普遍存在，按照英国人类学家、《金枝》的作者弗雷泽的观点，巫术是“一种真正全民的、全世界性的信仰”。它是人类童年时代所特有的以自我为中心，崇拜自身力量与意志的反映。在巫术世界里，虽然也存在鬼神这种超自然力量，但是它们都臣服于人的力量与意志，听凭人通过仪式来对它们调遣与使唤，这正是巫术不同于宗教的地方。这种对自身力量与意志的崇拜，如果说在最初的个人巫术阶段是人类的童心显现，表现着人对世界的巨大的热忱与高度的自信，有着人性最可宝贵的一面，那么发展到后来的公众巫术，它便与部落首领（大、王）的权力相结合，逐步异化为“以人治人”（《中庸》语）的权力意志与功利至上的实用理性。因此，公众巫术决不是巫术的公众化，而是把巫术作为治理公众的工具。部落首领垄断了行施巫术的权力（“绝地天通”），并随时把自己的意志说成是天与神的意志（天命、帝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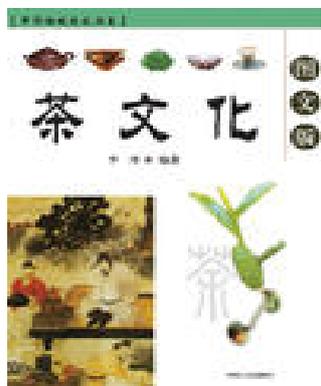
并且通过各种神秘而烦琐的仪式，将它意识形态化，从而变为部落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这就形成了早期原始部落的“政—巫”合一的社会结构；部落首领们对巫术性质的改变，同时也塑造了自己。在神与人之间，他们具有双重的代表身份——在神之前是人的代表；在人之前是神的代表。由此，“变”、“易”成为了巫性最基本的观念。可以断言，巫性的一系列重要观念都与史前原始部落首领兼巫师的角色、身份及其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以其权力意志与实用理性为核心内容，以原始的“时”、“位”意识为时空观、以“象”思维为基本的思维方式的一套观念体系。之所以称它为巫性的观念体系，区别于所谓的人文性观念，就因为它的现实基础是巫术文化，代表的是部落首领兼巫师的根本利益与精神诉求。

**今天人们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道文化，其实就诞生于巫文化之中**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开天辟地以来第一套观念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块基石，极富中国的特色与智慧。巫的早熟，使中国文化既不缺教、也不缺神，更不缺人，但是又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神与人，因为巫所秉持的意志主义，把它们都涂上了巫的色彩，使它们变为巫文化的一部分。今天人们视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儒、道文化，其实就诞生于巫文化之中，深受巫性观念的熏染。道家的“道”、“自然”，儒家的“天命”、“诚”、“天人合一”等观念可以说都与巫性观念有着深刻的血缘联系。明乎此，那个争了几十年的“儒教”与“儒学”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新的维度，这不光是学术的需要，更是现实实践的需要。因为宏扬与振兴一种文化，其首要的工作便是它的现代转型，而新的维度正使我们更加看清传统文化的真貌，从而明白转型从哪里开始。

（作者单位：《学术月刊》编辑部，此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报》2008 年第二期）



## 唐宋文人 茶 的文化意蕴

陈瑜、杜晓勤在《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撰文指出，中国茶文化兴起于唐，昌盛于宋。在茶文化兴盛过程中，文人雅士推波助澜，功不可没。对于唐宋文人的茶文化建设之功，现有研究成果大多从中晚唐以后文人著述茶书、酌泉品茗、创制茶具、精研茶艺等茶事本身加以探讨，充分肯定了唐宋文人在茶文化的精致化、高雅化等方面所起的历史作用。在对唐宋时期茶文化史料尤其是茶文学作品进行全面深入考察之后，我们发现唐宋文人对中国茶文化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们将日常茶事与自己的审美活动、精神追求、人格理想紧密结合起来，使饮茶品茗具有高妙的审美价值和玄远的生命意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茶文化——文人茶。唐宋文人尤其是宋代文人在酌泉品茗之时，不仅注重亲近自然，欣赏山川田园之美，找寻静谧平和的心灵安泊之所，而且能在慢斟闲饮之中，安贫乐道，乐天知命，静静地享受人生的乐趣，同时还将自己深邃的人生思考和高洁的人格追求融入其中，使得饮茶这一原本极其普通的日常品饮活动，升华为一种极其高雅的可审美、可静心、可明道、可励志的精神活动和文化享受。唐宋文人赋予文人茶的这些玄妙、深厚的文化意蕴，对宋代茶文化时代特征的形成乃至中国茶文化传统的积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 [学术综述]

## 一年来若干学术问题讨论综述

### ·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

#### 一、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与进路

王南湜认为，问题意识、理论意识和学术史意识的统一，应当成为“马学”者的自我定位；应当将理想性和现实性界分开来，恢复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精神，将其对市场经济的批判性功能视作其当代性的一个根本性方面。

吴晓明提出，回到社会现实本身，应当成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围绕旋转的枢轴。这就需要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启蒙”，把揭示社会现实的本质性内容作为最坚决的哲学任务和方法论要求标举出来。

孙正聿指出，时代精神主题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聚焦点；现实存在间距化标识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超越性；流行观念陌生化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基本理念概念化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力量之所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从“问题中的哲学”升华出“哲学中的问题”。

杨耕认为，马克思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以及建构中国马克思学的设想，从根本上制约着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趋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仅仅面对文本，更应面对实际。

贺来提出，马克思把哲学变成了一种干涉、介入和变革现实生活的方式，并因此使得哲学表现出与传统哲学极为不同的理论性质、言说方式和话语方式。不

能以传统哲学的理论存在样式来衡量和评价马克思的哲学性质,更不能用传统思辨哲学的话语方式和言说方式来理解和阐发马克思哲学。

陈先达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不能以对经典的解读为据,也不能以西方现代哲学或后现代主义的所谓共同“问题域”为据,而应求之于其基本原理的正确性。

张曙光认为,应在马克思的文本、思想自身的逻辑与我们的当代境遇和任务之间反复进行解释学的对话。必须坚持哲学思想与现实世界长期的相互作用和批判。

杨学功指出,学术与现实、学科与学说、返本与开新,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路径选择的依赖因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将学术性与现实性相统一;应构筑学科平台,形成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学术规范;应创造当代中国学者的理论架构。

## 二、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

### (一) 马克思文本解读与文献学研究的关系

张一兵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研究必须谨慎处理西方马克思学的文献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学研究之间的复杂关系,重要的是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内在理论逻辑的认识。并用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实践成果推进这一科学思想运动。他提出“后文本学”的新的方法论思考,认为生产性思想构境论,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将是“后文本学”方法论的真正本质;生产性的思想构境包括对象文本理路、我性诠释理路和互文性文本参照理路的共在这些不同的构境层。

鲁克俭以大量的文献学事实表明，文献学研究是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基础，对马克思文本的思想解读和理论研究才是最终目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应该成为我们进行马克思文本解读研究的科学方法论。

聂锦芳认为，完整的文本研究应包括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版本考证是文本解读和思想阐释的基础和条件，将为客观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思想提供扎实的文献基础。文本研究的意旨和归宿仍然是思想研究。

韩立新指出，《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不仅为我们正确理解《手稿》的思想内容以及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复杂过程奠定基础，而且对它的应用可能会给马克思主义研究带来一些革命性的进展。他提倡用“以马解马”的基本方法对经典文献以及MEGA2进行系统研究和解读。

## (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研究

聂锦芳认为，不考虑《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过程、刊布情形、版本源流，只凭借由别人编辑而成、俨然是一部完整的著述去对其内容进行解读，甚至单纯根据其中的只言片语就对其思想进行概括和评论，会造成误读和歧解。

夏凡认为，陶伯特等人将《德意志意识形态》变成了由若干独立的文稿组成的论文集，这种实证主义的编辑“新思路”实际上否定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确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史地位。《费尔巴哈》篇的手稿包含另外两次马克思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起草“绪论”的尝试，必须在正视上述文本学事实的基础上，把《费尔巴哈》篇编排为一个完整的文本，而不是独立文稿的结集。

韩立新指出，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应以汉译广松版为基本文本，同时参照新MEGA的先行版和涩谷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卡尔·马克思问题”、“市民社会历史观”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问题”的研究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

魏小萍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未定稿的五个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可被看作为第一卷《费尔巴哈》篇的缩影或思想轨迹的再现,几乎包括了唯物史观研究思路的几个主要方面。

姚顺良指出,恩格斯在对待施蒂纳、以赫斯为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费尔巴哈评价这三个问题上观点转变存在“断裂性”,与马克思观点演化的“连续性”不同,从而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章和整个《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过程中占有主导作用。

### (三)对“哲学笔记”的研究

张一兵认为,列宁的“哲学笔记”并不是作为一本书存在的,而只是记录了列宁二十余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亚文本和似文本群。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包含一定的非连续性的分期断代认识。“伯尔尼笔记”是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专题哲学研究,通过文本构境法对列宁的这一似文本进行新的解读,在某种程度上将颠覆苏联学者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计划构想论”的先验框架,探悉到列宁在接近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深刻思想转变。

周嘉昕认为,将“哲学笔记”视为独立的哲学著作,并构造一个列宁改造辩证法的“计划构想”,背离了列宁思想发展的原初语境,并在逻辑上呈现出内在的悖结。应抛弃传统研究的同质性思路,在俄国和列宁思想的真实历史语境中把握“哲学笔记”的内容和意义。

(盛丹艳)

# · 中国哲学史 ·

## 一、“中国哲学建构”问题研究

李明辉认为，中国哲学是中国人根据西方哲学模式建构起来的，但如果将哲学界定为“生活方式”或“生活艺术”，那么中国文化中有着长远而丰富的哲学传统。

高瑞泉认为，从哲学社会学角度来看，可以将现代性视为中国哲学现代转型的内在向度。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建构过程，同时也是现代精神创造的过程。

景海峰指出，对于中国哲学的当代反思，除了方法的检讨、思想的过滤和体系的省察之外，制度建构和体制保障方面的问题也应在清理之列。

郭齐勇认为，应该自觉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予以创造性转化。

李翔海指出，应在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的同时，深入、系统地开掘出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进而达成中西哲学之间双向互动的“诠释圆环”。

程志华认为，应在中国传统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作为共相的哲学学科规范下，通过化解时代问题来创制新的哲学学说，建构中国哲学主体性。

张立文认为，中国哲学要与西方哲学平等地对话，只有实现核心话题的转变、诠释文本的转换、人文语境的变化，才能建构当代中国的哲学形式——和合学。

李维武指出，对于中国哲学史，要开展“蕴含思想史维度的哲学史研究”，从方法论上作探讨和创新，使“思”与“史”、哲学创作与历史文化的联系鲜活地表现出来。

## 二、先秦儒学研究

吴根友认为，孔子主要从德的角度来讨论王者政治权力来源及其使用的合法性问题，开始从道与义两个层次讨论诸侯及士大夫政治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陈来认为，竹简《五行》篇论“德之行”与“行”的区分，强调德的内在性；论德行得以实现的心理开展过程及其外在体现，强调内在意识的发端对德行实现的根本性和原初性；论“善”与“德”的区分包涵了超越性的面向；在重视圣智观念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仁义的重要地位；其“圣”“智”说则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性，强调尊贤。

黄俊杰指出，古人强调年龄必须与个人精神修养与时俱进。所以，孔子以“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人生最高境界，孟子认为“七十者可以食肉”，就是“王道”政治的理想目标。

郑万耕指出，《易传》以孔子的易学观为指导，提出“三陈九卦”说，对履、谦、复等九卦反复加以论述，将孔子“观其德义”的思想具体化，以此作为防止和解除忧患的依据。

李亚彬认为，子思及其后学思想中包含了性善论所有必要的前提和观点，孟子在此基础上把各个环节串联起来，以人的道德属性为人性，并得出了明确的性善论：人性是天赋的，天赋的道德本身是善的，所以人性是善的。

## 三、道家哲学研究

王焱指出，庄子既反对“江海之士”的避世，也反对儒家的入世，而倡导游世，游世乃是一种既顺应这个社会，又不丧失自我追求的处世态度，也就是“外化而内不化”。

暴庆刚认为，郭象之逍遥义包含圣人之“无待”逍遥与众生之“有待”逍遥两个层次：前者从“心”上言逍遥，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承接；后者从“性”上言逍遥，是对庄子逍遥义的拓展。

李延仓指出，庄子哲学在整体上表现出一种“贵道贱物”的倾向。郭象《庄子注》从玄学视角解构道体，宣扬“物本自然”；成玄英则从道教重玄学视角，不仅肯认道体“自然”。又主张物性“自然”，表现出二元“自然”观念。

马德邻认为，老子哲学对现实的批判性反思，在语言层面上被赋予“正言若反”的特征，最终落实为“无”的形上体认，恰似苏格拉底开启的反讽传统。

李霞认为，老子对“生”与“死”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具有自然主义色彩的生死观。庄子在老子高扬“生”的价值之后，转而深究“死”的价值，提出了以“生死物化”等为主要观点的生死观。

## 四、宋明理学研究

陈来认为，在《中庸章句》中，理学的理气论、天理论、心性论、功夫论都得到了全面的贯彻，成功地借助对于经典的系统解释展示了新儒学的理论构建。

李景林、田智忠认为，朱子心论以“情”为心的主体内容，以仁为“心之德”，在“爱”或情的实存活动上来把握心的整体义涵。心的“知觉”内在于情，构成人的生命存在之内在的主宰和定向作用。

薛富兴认为，程朱的“格物致知”论是儒家哲学体系中最为发达的认识论成果，其最主要特征是客观外求的认知主义思维路线，这与中国古典哲学主观内省的大传统相左。

李承贵指出，朱熹认为佛教的本体观是“世界为幻、为空”，而佛教的教理、教义不过是这种本体观的具体诉说。但是，朱熹将佛教本体论归结为佛教之“空观”是片面的，其对佛教“空观”的理解是隔膜的、误读的。

蔡方鹿认为，邵雍通过以义理解经，阐发本体论哲学，重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将儒家经学由原来的重训诂注疏传统转换为重义理阐发、重人情物理的心性之学。

## 五、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邓晓芒指出，不能将儒家的“互隐”解释为“沉默不言”，苏格拉底赞成“子告父”是因为它本身的“公正”。在当今时代条件下，首要的任务是建立健全的法制和人权观念。

吴学国、秦琰认为，阳明心学的实质是精神的自身意识，其理论表现是对自我的追问。阳明心学的本体论其实源于印度吠檀多，后者的基本观念是存在真理和自我本质的统一，即心性一如。

刘延苗、何炳武指出，康德那里，道德虽是至上的善，但还不是圆满的善，道德与作为道德之结果的幸福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至善”；朱熹认为，道德就是“至善”，“至善”与感性幸福无关而且对立。

黄玉顺认为，儒学的“恻隐”不是舍勒的“同情”：恻隐并不基于认知或“再感知”，不是“再体验”，也不是“价值盲”，而是价值源泉。恻隐即爱或爱的原初显现，是一切形而上学与形而下学的本源。

林忠军指出，孔子关于易学解释已具有了西方解释学的意味，与西方人不同的是孔子仍然未放弃中国传统的文字训释、象数和史学等方法，并以之为哲学解释的进路。孔子及其后学的易学解释学，是一种循环的解释学。

(董祥勇)

## · 西方哲学史 ·

### 一、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

田平就西方行动哲学家在意愿自由的深层次上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解决方案作了介绍，并指出了各种观点的局限性。他提出，目的论的视角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解决也许是根本的。

章雪富认为，斐洛把自由意志看成自决的自由，注意到了自由意志的张力，越出了希腊哲学把自由意志与知识论对应起来的思考范式。斐洛基于犹太传统，使用并发掘希腊哲学的宗教性诉求，开了西方思想史以及基督教传统讨论自由意志和罪的先声。

张荣认为，“Willki jr”概念在国内学术界迄今没有找到一个恰当和统一的中文表述，这主要是因为对西方自由(意志)理论之中世纪渊源的漠视、对康德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之间的内在深刻关联的人为断裂所造成的。

### 二、康德伦理学研究

李建华、覃青必认为，康德的道德自由观是在先验的道德法则与意志自由的完美结合中取得它的特定内涵的。他主要就康德道德自由的内涵、动力、对象和实现作了系统的梳理。

邓安庆认为,康德道德神学是实践理性通达本体存在的必然步骤,是康德孜孜以求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完成,故具有体系的意义。从这种新的形而上学的体系意义中,我们可以比较深入地发现康德道德神学的启蒙意义。

崔平认为,康德的批判伦理学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在逻辑上缺乏完整揭示认识对象的内在构成规律的能力,导致其伦理学的空洞性。康德断然排除了普遍定义的可能性,丧失了综合方法所要求的至关重要的认识起点,从而也就在根本上远离了本真的先验批判。

### 三、现象学研究

#### (一)对现象学的纯粹性与不纯粹性的讨论

倪梁康认为,“纯粹”概念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有明确的意义,不仅指纯粹数学所具有的那种纯粹性,而且还意味着纯粹反思的纯粹性。纯粹的和纯粹的现象学代表了目前现象学研究界的两种思考方向。

刘永富则通过对“怎样才算现象学的视域”,“怎样才算现象学的视域纯粹”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前提性问题的澄清,认为“现象学的视域中的纯粹哲学”就是关于所可能知的一切归根到底只能如何的思辨的学问。

陈家琪讨论了胡塞尔坚持的“纯粹意识哲学”的信念,特别是他有关“生活世界”的论述,并在康德所区分的“通俗的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强调直观和描述是否可能把哲学的“通俗概念”与“纯粹概念”重新统一起来的问题。

张再林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入径,对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身体性进行重新发现和梳理,希望有助于中国古典哲学的正本清源,并为回归一种更彻底、更根本的“不纯粹”的“生活世界”提供坚实的基础。

## (二) 对海德格尔的研究

张志扬认为，赫拉克利特残篇十六说的是“人如何能在永不灭者面前保持隐蔽？”海德格尔的解释既注意关键词语在当时用语中的各种可能之义，又不忘整体把握的应有之义，从而解读出思想开端处的初始经验于惊奇中的生成性奥秘。

柯小刚就海德格尔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作了介绍，并指出，海德格尔的解读受如下道路之导引：行其所能通达，亦止于其所不能逾越。（西方）哲学道路之短长与开阖，于斯可见一斑。这构成了我们重新解读海德格尔之《精神现象学》解读的意义。

孙冠臣认为，如果说前期海德格尔对康德的存在论解释主要是建构性的话，那么后期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判则主要是解构性的。把海德格尔前后期的思想贯通起来，可以勾勒出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思之途。

## (三) 列维纳斯研究

叶秀山认为，列维纳斯颠覆了传统的“存在论—知识论”，“开创”了“价值”、“伦理”和“宗教”的“领域”，强调伦理学才是形而上学。在他那里，作为哲学“主题—对象”的不是“诸存在者”，而是“时间性—历史性的—自由的”“存在”。

王恒认为，列维纳斯以不可见的他者为宗旨的现象学描述是现象学运动中一道别样的景观。从时间与主体在根本上是同一的这个现象学的关键来说，列维纳斯仍然是现象学家。

汪堂家指出，海德格尔从死亡的角度观察生命，而列维纳斯则是将死亡与生命的观点一起考虑，因为他觉得只有生命才能为我们打开可能性；从生命的视角看，死亡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即不可能性。

## 四、分析哲学研究——聚焦意义理论

张燕京、李颖新指出，达米特从语言的工作方式出发研究意义理论，认为在刻画语言实践中不能假定任何已被说话者所理解的概念，在需要引入理论概念刻画语言实践时，这些概念的内容必须依赖于它们在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这回应了“当代意义理论如何可能”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

陈嘉明认为，西方知识观正经历从近现代追求知识的客观必然性、整体性与绝对性，到后现代张扬知识的“游戏”性、意义的可解释性与多样性的变化，这显示出人类认识发展的一种趋向，即从对“一”（整体性）的认识，进入到对“多”（差异性）的认识。

蒯益民就专名意义问题推荐一种生活整体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试图表明这样一种立场，它远离以弗雷格和克里普克为代表的哲学家试图将栖息于不断变化的生活之流中的语义内容逻辑化的做法，转而使奎因和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语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在专名意义问题上得到体现和推进。

梁义民、任晓明认为，戴维森纲领利用塔尔斯基真理形式语义学刻画自然语言意义这一根本性语义学问题的创造性构想，使得弗雷格等人的真值条件意义思想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是20世纪语义学研究领域的一次伟大的“思想实验”。

## 五、对分析哲学与现象学之间关系的研究

江怡认为，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对话是发生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历史现实。弗雷格与胡塞尔、维特根斯坦与海德格尔的对话在一定意义上促成了各自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这可以揭示这两种哲学传统的共同思想根源和联系，从而可以使我们寻得二者之间开始交流乃至融合的逻辑原因。

张庆熊指出，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中，有一些涉及意向性问题的论述。新近出版的《维特根斯坦的声音：维也纳团体，维特根斯坦和魏斯曼》对布伦塔诺及其意向性概念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徐英瑾认为，约翰·塞尔在论文《现象学幻相》中详述了自己为何拒绝现象学(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的理由，批评了海德格尔哲学的“视角主义”。该文的真正价值在于挑明了英美心灵哲学与欧陆现象学之间实质性的分歧。

(黄济鳌)

## • 伦理学 •

### 一、理论伦理学

#### (一)关于伦理学基本问题的讨论

肖群忠认为，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观的根本问题，即道与德、义与利、群与己的关系问题，简而言之，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义利群己的关系问题。

宋希仁认为，实存的伦理关系是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历史性统一，伦理关系本质上是现实合理性秩序中的关系，是有主体精神渗透其中并通过道德、法律、习俗等规则体系维系的关系，它的首要问题是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

关键英认为，伦理学就是一种生活观，伦理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范式的转换，即由思想史转向道德生活史，研究社会变迁中的道德变迁，研究具体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伦理关系，研究民众层面的日常道德生活。

#### (二)关于德性的讨论

高国希认为,道德、幸福只有在社会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制度缺少了品性的支撑是空洞的,德性缺少了制度的规约是盲目的。涵养品格、造就德性、负责的当代公民、自觉行使权力承担义务责任,在公正的好社会中实现每个人的幸福生活就是道德标准。

戴兆国认为,德性伦理强调以人类自身的内在品质作为人的一切生活的出发点,这不仅使德性伦理在人类伦理思想的起源处规避着人类伦理生活的方向,而且在现代遭遇道德困境的形势下,又指示着人类伦理生活应该采取的态度。

李兰芬认为,德性生成和发展的文化依托、文化属性和文化载体构成了德性文化视阈的基本框架,传统、习俗、媒介构成了德性生存、发展的文化律令和文化信念。

俞世伟认为,规范约束的外力不内化于德性的自律,就难以知善恶、辨美丑、识真伪,这足以表明德性建构的重要性;德行的自律不为社会伦理氛围所支撑,难以显良知、倡世风、立楷模,这足以见德性化为德行的重要性。所以,关联着规范和德性始终的中介德性既涉及规范的建构,又依赖着行为的情境。

### (三)关于价值论研究的讨论

王玉梁认为,在价值论的研究中应将关系说、系统说、功能说结合起来,吸收人道价值论重视人的生命、自由、尊严、权利和规范价值的合理之处,克服主客体关系论的不足。

孙伟平提出,价值作为历史范畴的特性决定了必须立足于历史的维度、运用历史方法对其加以研究。而时间上不可逆性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了人的一切价值活动的背景和空间。因此,价值论研究的历史维度、历史方法,必须具体地从时间维度加以理解和把握。

周鸿雁认为,中西价值哲学的比较研究应是当代中国价值哲学研究实现研究思路和方法转换的一条有效途径,这一研究应包括中西价值哲学发生和演进、主要问题、研究方法和方式、主要成果、社会作用及研究者治学精神这六方面的比较研究。

马俊峰指出,必须重视和发展规范价值的研究。这一研究在理论上可以缓解价值的感性确定性与文化、社会的超越性,特殊性与普遍性,主观性与客观性之间的矛盾;在实践中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形成一定关于人的价值和行为规范的合理理论根据。

胡敏中则针对马俊峰的观点,指出我国价值论研究的出路之一在于研究规范价值。但规范价值不仅是同非规范价值相对应,也是同整个非价值规范相对应的,只有区分这些不同的规范、揭示其不同的意义,并将价值规范和价值共识统一起来研究,才能真正全面地阐发规范的价值意义。

## 二、应用伦理学

### (一)关于应用伦理学性质的讨论

卢风认为,应用伦理学的程序共识论者根本否认应用伦理学提供伦理专门知识的可能性,但西方伦理学家认为,应用伦理学可提供遇到的推理的专门知识,而应用伦理学更为重要的作用在于通过哲学反思和社会批判昭示一种正当的生活方式。

宣兆凯认为,从现实生活出发是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本性。应用伦理学只有扎根于原生的土壤中,才能发现和解决其中不断出现的道德现象和道德问题;而不断吸纳、整合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不断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是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特征,也是应用伦理学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 (二) 关于环境伦理学的讨论

孙道进认为,环境(生态)伦理学一开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在于其背后隐藏的四大哲学困境:“荒野”自然观的本体论困境;自然的“内在价值”困境;“敬畏生命”的方法论困境;“整体主义”的认识论困境。

孙美堂指出,环境伦理学中“人类中心论”与“非人类中心论”之辩存在共同的前提性错误:将不同逻辑层面的问题置于同一层面,试图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环境伦理学要走出这一话语圈套,需要区分三层境界:朴素的人类中心论、无立场的众生平等论、既人类立场又超人类立场的众生和谐论。环境伦理学根本问题是要在人类立场与超越人类立场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

袁振辉、曹丽丽通过分析环境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学派各自合理性和局限性,指出只有建立在复杂性视野下的发生主体论,即把主体视为由自在主体、自为主体、自觉主体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和网络系统,才能是超越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的新平台。

高予远认为,环境伦理无法从自然的“是”中推导出伦理的“应当”,只有将人类道德的“应当”视为自然生命进化流程中产生的最高“是”,环境伦理才会有自己真正的基础。

## (三) 关于企业伦理中企业社会责任的讨论

曹凤月认为,企业作为利益关系的存在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必然性,企业作为契约性的存在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必要性,企业作为“共生”的存在构成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应然性。

李淑英提出,仅仅从外延角度界定企业社会责任,无法满足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期望。在实际生活中,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依据寄予企业的期望进行不断调适,企业的责任取决于那些与企业有着密切关系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愿望,取决于企业和社会、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以及最终达成的共识。

龚天平认为,企业作为一种利益性的和契约性的存在,承担着企业公民角色,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而且在社会中过大的权利也需要承担道德责任来加以制衡。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是一个与企业的实际状况、经济实力、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及权限等密切相关、逐步扩展的过程。

#### (四)关于发展伦理学的讨论

林春逸指出,发展伦理学是以当代人类整体发展实践提出的伦理问题作为对象的。发展伦理学应主要回答人类发展中出现的三大问题:人类在有限而脆弱的地球上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的问题;发展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发展中生活美好与物品丰富的问题。

刘福森认为,发展伦理学实质是追求发展的合理性,既不同于传统伦理学,也不同于生态伦理学。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是发展伦理学的终极关怀。发展伦理学的理论实质与价值就在于解决现代人类所陷入的生存危机。

(张 伟)

(来源:《学术月刊》2008年第一期)

# [读书]



## 王小波：

### 我的师承

我终于有了勇气来谈谈我在文学上的师承。小时候，有一次我哥哥给我念过查良铮先生译的《青铜骑士》：

我爱你，彼得兴建的大城，  
我爱你严肃整齐的面容，  
涅瓦河的水流多么庄严，  
大理石铺在它的两岸……

他还告诉我说，这是雍容华贵的英雄体诗，是最好的文字。相比之下，另一位先生译的《青铜骑士》就不够好：

我爱你彼得的营造  
我爱你庄严的外貌……

现在我明白，后一位先生准是东北人，他的译诗带有二人转的调子，和查先生的译诗相比，高下立判。那一年我十五岁，就懂得了什么样的文字才能叫做好。

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字境界。道乾先生曾是诗人，后来做了翻译家，文字功夫炉火纯青。他一生坎坷，晚年的译笔沉痛之极。请听听《情人》开头的一段：

我已经老了。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主动介绍自己，他对我说：“我认识你，我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这也是王先生一生的写照。杜拉斯的文章好，但王先生译笔也好，无限沧桑尽在其中。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帮助的总和还要大。现代文学的其他知识，可以很容易地学到。但假如没有像查先生和王先生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除了这两位先生，别的翻译家也用最好的文学语言写作，比方说，德国诗选里有这样的译诗：

朝雾初升，落叶飘零

让我们把美酒满斟！

带有一种永难忘记的韵律，这就是诗啊。对于这些先生，我何止是尊敬他们——我爱他们。他们对现代汉语的把握和感觉，至今无人可比。一个人能对自己的母语做这样的贡献，也算不虚此生。

道乾先生和良铮先生都曾是才华横溢的诗人，后来，因为他们杰出的文学素质和自尊，都不能写作，只能当翻译家。就是这样，他们还是留下了黄钟大吕似的文字。文字是用来读，用来听，不是用来看的——要看不如去看小人书。不懂

这一点，就只能写出充满噪声的文字垃圾。思想、语言、文字，是一体的，假如念起来乱糟糟，意思也不会好——这是最简单的真理，但假如没有前辈来告诉我，我怎么会知道啊。有时我也写点不负责任的粗糙文字，以后重读时，惭愧得无地自容，真想自己脱了裤子请道乾先生打我两棍。孟子曾说，无耻之耻，无耻矣。现在我在文学上是个有廉耻的人，都是多亏了这些先生的教诲。对我来说，他们的作品是比鞭子还有力量的鞭策。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读他们译的书，是我的责任。

现在的人会说，王先生和查先生都是翻译家。翻译家和著作家在文学史上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话也对，但总要看看写的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文学次序是彻底颠倒了的：末流的作品有一流的名声，一流的作品却默默无闻。最让人痛心的是，最好的作品并没有写出来。这些作品理应由查良铮先生、王道乾先生在壮年时写出来的，现在成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了……以他们二位年轻时的抱负，晚年的余晖，在中年时如有现在的环境，写不出好作品是不可能的。可惜良铮先生、道乾先生都不在了……

回想我年轻时，偷偷地读到过傅雷、汝龙等先生的散文译笔，这些文字都是好的。但是最好的，还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最重要的是：在中国，已经有了一种纯正完美的现代文学语言，剩下的事只是学习，这已经是很容易的事了。我们不需要用难听的方言，也不必用艰涩、缺少表现力的文言来写作。作家们为什么现在还爱用劣等的文字来写作，非我所能知道。但若因此忽略前辈翻译家对文学的贡献，又何止是不公道。

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说，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极为悦耳，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我既不懂法文，也不懂意大利文，但我能够听到小说的韵律。这要归功于诗人留下的遗产。

我一直想承认我的文学师承是这样一条鲜为人知的线索。这是给我脸上贴金。但就是在道乾先生、良铮先生都已故世之后，我也没有勇气写这样的文章。因为假如自己写得不好，就是给他们脸上抹黑。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我们年轻时都知道，想要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但是他们的书还在，可以成为学习文学的范本。我最终写出了这些，不是因为我的书已经写得好了，而是因为，不把这个秘密说出来，对现在的年轻人是不公道的。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些，只按名声来理解文学，就会不知道什么是坏，什么是好。

《信息导航》

2008年第2期 总第二期

主编：孙俊杰

编委：吕艳华 夏文华 冯琴

主管：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

主办：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信息咨询部

地址：山西师范大学图书馆业务楼一层

邮编：041004

电话：（0357）2055679

E-mail: [sxsdtsgxxzx1@163.com](mailto:sxsdtsgxxzx1@163.com)

出版时间：2008年6月